

新世纪

前瞻丛书

知识社会

〔加〕尼科·斯特尔著

KNOWLEDGE
SOCIETIES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世纪前瞻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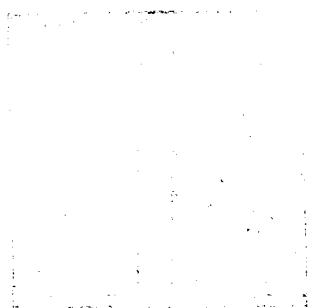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71 1272 9

知识社会

[加]尼科·斯特尔著

殷晓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ehr)
的社
的著作
手)。

计:吴

6



2 >

· 015

Nico Stehr

KNOWLEDGE SOCIETIES

Sage Publication Ltd, London, 1994

本书根据伦敦塞奇出版有限公司 1994 年版译出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 Nico Stehr 1994

图字:09-1997-137 号

知识社会

[加]尼科·斯特尔 著

殷晓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4 字数 305,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7-5327-2240-6/C·015

定价:22.00 元

中译本序

6-4-66

在 整个世界的范围内，我们的时代正经历着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无论人们对于这种变化的领会程度如何，也无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于这种变化的缘由、动力和去向作何种判断，它都在实际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生活，并以生活本身的那种切近性和紧迫性向我们提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后起的、但正以迅速的步伐走向现代化进程的民族来说，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没有被淡化、被延宕，相反却以同等的切近性、甚至是更强的紧迫性展示出来，因为与问题的遭遇总是相对于前进的速率而迎面扑来的。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知识社会》——就把我们带到了这种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并且因此而向我们逐一展示由这一变化而引发的各种问题，无论问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还是涉及到它的社会方面或文化方面。在这里，虽说提示的问题可以是极其广泛的，但这些问题由以产生的那个核心则被概括为这样一种根本的变化，即“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

如果说那些最初为近代社会学奠定基础的思想家已经在其理论中、并通过其理论逻辑而提示了“工业社会”之自我转变的

可能性的话,那么,对于这一社会之转向“知识社会”的明确意识则是特别地发端于本世纪的中叶。60年代,正像罗伯特·莱恩最早提出“知识社会”这一术语并给出其定义一样,彼得·德鲁克在其著作中要求将知识置于“我们社会的中心”,“置于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础”的地位。然而,对于“知识社会”作出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因而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丹尼·贝尔。在其关于“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讨论中,丹尼·贝尔不仅使用了“知识社会”这一术语,并且指证后工业社会在双重的意义上直接就是知识社会。因为第一,革新的源泉日益从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中衍生出来;第二,由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的较大部分所测定的“社会的份额”在知识领域中日益增加。

《知识社会》的作者尼科·斯特尔以其广阔的理论视野对“知识社会”这一概念的使用进行了综合,并对种种不同用法的意义进行了社会学方面的批评性考察。在他看来,“知识社会”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变化过程,虽说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但却是十分真实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确定特征发生了变化、新的特征正在出现;而那种正在生成的社会正日益受到“知识”的驱动。如果我们有理由把作为某个社会之基本方面的社会关系的那种特殊性质确定为识别性标志的话,那么,今天的“知识社会”概念正像过去的“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概念一样,是相当恰如其分的。因此,斯特尔提出,如果现代社会仍仅仅根据财产(资本)和劳动而被认识,那么这种认识就会是不充分的。问题不在于这种认识以之作为前提的那种社会关系已经不复存在,而在于应当把目前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综合进去。“尽管劳动和财产的这些属性确实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一种新的原则,也就是‘知识’已经被加进来了,这个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对

作为社会的基本机制的财产和劳动既进行了改造，又提出了挑战。”

“知识社会”的概念首先立足于并且描述了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按照斯特尔的归纳，工业社会的经济最初主要是一种物质经济，其突出的特征是：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由对生产过程及其组织的物投入所推动和控制。其次，物质经济逐渐地转变成一种货币经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现了这一转变，亦即物经济向某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制于货币事务的经济转变。最后，目前正在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货币经济正在日益成为一种“非货币的符号经济”。在货币经济中，生产和分配过程方面的变化更加由符号的或以知识为基础的投入所决定。换言之，这种经济方面的变化意味着知识日益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方面，日益成为生产过程扩张的基本条件。在这种经济中，很显然，“劳动时间的总数或有形资本的总数”的意义正在被削弱，而企业的大部分财富正日益体现在它对于信息、知识、专门人才的掌握及创造性的运用上。在这种经济中起关键作用的“符号经济”往往是数据、技术轨道、统计、程序、产品销售和组织的“知识”，以及在国内和国际间日渐增多的信息流动，如此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与日俱增，并从而产生了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及社会意义的强大推动力。本书的第5章“关于知识的知识”，就是对于此种分析的概括和评论；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被标识为“作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的科学”。这样一个对于知识社会来说本质重要的命题，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由于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导回到生产力或生产资料，并且由于把人对自然的理解以及人作为社会存在而对自然的控制理解为“生产和财富的伟大基

石”，所以一般的知识便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这个理论预示在当代经验中的深沉回响特别地反映在里克塔等人以《面临抉择的文明》为题的著作中。这部著作强调指出，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遵循一种高度优先的法则，亦即科学优先于技术，技术优先于工业。这是因为现在的科学不再主要是社会意识的一个部分，而首先是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转变成科学的应用。正是在这种转变的基础上，斯特尔把科学之社会意义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直到 18 世纪末，科学作为意义或社会意识的生产者，主要是一种对于社会观的评判；第二，在此后的一个世纪，科学就其被凝固为机器而言，是一种生产力；就其作为一种“纯”科学而得到发展，它又不是一种生产力；第三，在本世纪中，科学已经日益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或“述行的(performative)”力量。这样的一种转变同样体现在关于知识概念的区分上，它们是：(1) 意义的知识；(2) 生产性的知识；(3) 行为知识。其中最关重要的是第三种知识，它是最为新近发展起来的知识样式。这种知识样式“作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可以被认为是行为知识(Handlungswissen)，因为这样的知识已经是社会行为的一个直接形式。它是直接的行为能力，这包括创造更多的(新)知识的能力。”在这里，通过所谓“述行的力量”或“直接的行为能力”等等，我们的作者想要强调的是或多或少被贝尔和里克塔所忽略的东西，即：重大变化的根源不仅在于科学知识之更加广泛的运用，而且特别在于“新型知识”的生产，并以此为重点来处理知识生产的“社会学方面的独到之处和特性”以及“知识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至于在“知识社会”这一主题之下的极其广泛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题材，——例如，制造业的变化、第三部门(产业)

的兴起、符号经济、增长的新极限、集中和控制、“知识阶级”问题、社会生活的分裂和同质化、“全球化”问题，以及从就业社会到消费社会，从操作的社会到学习的社会等等，读者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去了解这一变化过程所蕴含的各种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社会意义。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两点：第一，理解变化所引发的问题的实质，通过对问题之种种冲突的观念去领会发展的可能性及前景。由于这样的变化和发展还只是一些新近发生的趋势，所以目前还谈不上十分稳定的结论，而往往只是一些各自分离、甚至彼此冲突的推论。事实上，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的优势决不在于它能够提供什么现成的答案，恰好相反，它的优势全在于揭示问题，在于概括围绕问题所形成的种种不同的理论或冲突的观念。第二，必须把这里所展示出来的问题理解成我们自己的问题，理解为与我们的未来命运攸关的问题。只要“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经验事实是无可否认的，并且只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目标不被中止、不被撤销，那么这里的一切问题都必关乎“阁下自己的事情”。不用说，特殊性和差别在这里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同样不用说，在这种特殊性和差别的基地上去掌握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一项更其烦难的任务。

举例来说，《知识社会》中提到的两个命题很能吸引我们的兴趣。其中的一个是说，在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中，原材料的作用正在降低。对这一命题起支撑作用的统计是：大部分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并没有带来经济的衰退，恰恰相反，生产反而增长了（或许要除开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材料交易的国家）。甚至有人认为，现在一个工业生产单位所需的原材料数量绝对低于1900年所需数量的 $\frac{2}{5}$ ，并且这种下降的趋势正在加快。然而，斯特尔指出，虽说这些特殊的估计只能被有

保留地接受,而且必须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这类评估,但是由此形成的挑战性观点仍然不失其重要性,换言之,必须根据这些发展来重新审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这一论题了。另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命题是,在知识社会中,“生产反对就业”。在发达国家中,农业或工业部门就业率的下降被经济学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因而“充分就业”观念所引导的问题是:服务部门是否能够以就业的增长来补偿这些损失,以及它具有怎样的能力去创造工作机会。而新近的发展对于“充分就业”的挑战在于:在知识社会中,恢复充分就业的假定不再可行了;因为正在发生的技术变化对服务部门的影响不仅使得该部门不再能指望吸收其他部门替换下来的雇员,而且该部门本身也将促使大量可获得的工作数量的减少。不难看出,在这里,由变化的趋势所引发的问题是被触及到了,但问题根本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斯特尔只是引用了汉纳·阿伦德特的“两难的描述”;一方面,从事劳动的社会日益从工作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从事劳动的社会日益失去工作。进而言之,这种变化趋势及其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确实,这是需要——如同某位哲学家所说——“停下来想一想”的。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这些变化“事实”、统计、观念和评估等等决不是什么现成的东西,正像它们不应该被直接套用到我们的经验世界上一样,它们也不应该鼓动起盲目的乐观主义和同样盲目的悲观主义。如果说《知识社会》所谈论的一切毕竟于我们具有启发作用的话,那么这种有益的作用决不是中止或撤销我们自己的问题,相反,是真正提出这样的问题。

本书的最后两章较多地牵涉到对于“知识社会”的价值评判问题。确实,这是最复杂的问题,同时也是最关根本的问题。因为

它不仅牵涉到在现代社会中彼此冲突的社会目的或社会理想，而且牵涉到此等目的或理想之或者公开或者隐蔽的哲学根基。回顾起来，事实上在“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这种对立就在各个领域以不同的样式绽露出来。正像在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处有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对立一样，在本世纪初有与科技进步、理性、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等等全然背道而驰的价值评判。如果说它的一端乃是完全无批评的实证主义的话，那么它的另一端也许可以被称之为以乌托邦构造为特色的批判主义。这样的对立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终结；只要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作的《展望二十一世纪》，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那种缺乏反思的、冷漠的实证主义如何激起了激进批判主义的不无理由的愤怒抗议。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到某些以思想深刻著称的社会理论家——如韦伯、席美尔等——对于所谓“文明进步”的颇为矛盾的态度时，当我们看到面对“知识社会”之兴起而出现全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时，就不会过分惊奇了。

《知识社会》的一个功绩是，它没有回避这样的矛盾和对立，而是使之在讨论的主题中得到呈现。这部著作不仅在多方面涉及了“知识社会”之可能的“负面”结果，而且指证了以马尔库塞和谢尔斯基为代表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在部分地揭示现代社会之关键特征和内在缺陷方面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确实想更加深入地理解所谓“科学的文明”，那么被归纳出来的谢尔斯基的问题表是值得一读并引起深思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知识社会》的作者在处理这个重大问题时力不从心，至少其自身的立场是不明确的。他过分简单地把对当代社会的抗议和批判打发到一般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中去，但这样的做法既不能防止自身的立场堕入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也不能

使“伟大的乐观主义”因此就不再是盲目的。事实上，要批评当代诸多社会批判的浪漫主义倾向以及先验的形而上学构造并不困难，困难的是理解这种批判参与构成的对立的社会意义，以及扬弃这种对立的社会基地和哲学前提。在这里，我们不想扯得太远，我们也不是要苛求作者，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知识社会》毕竟提出了一系列切近而紧迫的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毕竟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和思索，那么，这本书就的确值得一读了。

殷晓蓉

1998.10.20 于复旦园

致 谢

本书中所阐述的某些构想是对一篇论文——它最早是由我与热诺特·博姆合写、后作为我们的文集《知识社会》(1986年)中的一篇文稿发表——中的思想的独特改写和扩充。我要感谢热诺特·博姆对我这样做给予了善意的允诺。我在从事这项研究时,利用了阿尔伯特大学的美好的工作环境,我非常感谢阿尔伯特大学的慷慨。我还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意大利的贝拉焦的洛克菲勒中心,我度过了充满智慧挑战的一段时光。本项研究工作的中心部分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关于这个项目的研究还得到了来自加拿大渥太华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基金的赞助。

我感谢齐格蒙特·鲍曼、保罗·伯纳德、戴维·布鲁尔、热诺特·博姆、S·N·艾森施塔特、理查德·V·埃里克森、埃利奥特·弗赖德森、卡罗尔·J·克劳提克、唐纳德·N·莱文、罗伯特·K·默顿、雷蒙德·莫罗和赫尔曼·斯特拉瑟诸位先生对这项研究成果的不同章节和不同方面所作的批评性和鼓励性的评论。或许多此一举,我所要提及的是,他们不一定总是赞同我所阐述的主要观点以及我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基本解释。我在材料的搜寻和获取方面常常碰到查找和汇总的困难,为此,我特别要感谢丹尼斯·布雷和盖伊·C·杰曼的帮助。

序 言

由于劳动和财产的时代结束，今天的社会科学应该有一项新的议事日程。不过，现代社会仍然是普遍地根据财产和劳动来理解的。在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理论和现实中，劳动和财产已经有了一种延伸开来的紧密联系。在实践中，个体被迫在它们与这些要素的关系的基础上确定其特性。然而，随着劳动和财产（资本）逐渐地被一种新的基本要素——即知识——所取代，以往的例如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为中心的斗争和竞争也让位于对一度曾与劳动和财产紧密相连的信仰和价值的越来越感到不满的情绪，并最终导致了非常不同的道德、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争论和冲突。我认为，这些现实要求对旨在清楚地阐述现代社会的社会理论的议事日程作出一种新的考察。

本书的写作是为了回应以下的基本看法，即当代科学不仅仅如同人们曾经普遍认为的那样，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秘密和灾难的钥匙和解答，而且是一个世界的生成。科学已经将某个预言世界末日的恶梦变成了一种具体的可能：一旦发生战争或环境的灾难，人类的毁灭将是相当真实的。不过，科学家还是这些或其他可怕事情的占有统治地位的——尽管并非是没有争议的——认识权威。我们的世界是逐渐由科学所造就的，而我们对于

这些变化的理解也越来越依赖于在科学中所产生的那些思想。

显而易见,科学和技术正在诸如工作、教育、物质再生产、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方面改造着我们的基本社会机构。关于科学知识将揭示自然和宇宙的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奥秘的希望,以及关于诸如此类的洞见最终将有益于建设一个更好的、以自然的设计为基础、但又是造福于人类的世界的希望,是一个长久以来与科学活动的合法性连在一起的梦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代表着一个世界的生成的思想事实上可能意味着:这个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就要被实现了。根据人们心里可能想到的东西而言,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梦想可能又不会按照被想象出来的非常特殊的方式来实现。因此,看似矛盾的是,随着对科学的益处的普遍信念的弱化——这弱化部分地出于对科学的科学反思,^①科学知识对于生活世界的影响还在增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科学知识的力量来说就不存在什么限制了。在过去的那个世纪中,人们普遍表露出科学知识不久将消除传统的“知识”和信念的希望或担忧,尽管如此,非科学型的知识在现代社会的明显存在和作用至少对科学的认识权威提出了某些限制。这样,任何有关科学的社会基础和影响的分析也

^① 不过,由哲学家、神学家、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先是对技术,后是对科学的批判有一种相当悠久的传统,而且,正如某些人会看到的那样,有一种令人敬重的传统,至少在某些社会中是这样。例如,在德国,在当代最初几次经济萧条中的一次萧条(1873—1896)中,对于科学的物质成果的怀疑之声响彻在知识分子当中。然而,有关科学的道德和文化影响的许多忧虑也在这个过程中提出来了(参见克恩凯,1986;达马,1988)。一部与技术的发展相关联的乌托邦的设计史,以及在几个世纪中几乎是与诸如此类的设计蓝图相伴随的批判史,可以见之于西布利(1973)。

不得不考察其明显的限制。^①不过, 尽管对于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益处有着越来越普遍的怀疑, 但在大部分情况下, 对于由科学以及科学知识的完成(例如以技术制成品为形式)而造成的危险和断裂的“解决”, 还是需要必须是来自于科学和技术的答案和解释。绝大部分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行为都无法真正超越科学。在发达社会的公开论述中, 科学知识作为合法性的一个源泉, 近乎有着某种垄断权。目前, 这种垄断权并没有遭到科学中的认识方面的异议和作为专家的科学家中的认识方面的异议的根本破坏。

在许多社会科学家和科学家的心目中, 与科学和技术仍然(至少直到最近)具有的那个形象相对立的是, 这些由人类生活的“科学化”所导致的变化并非总是被清楚划分的、或是线型(发展)的, 也不是被主要看作是有益处的、或看作是预先计划的结果。从另一方面看, 它们也不主要是压制的结果, 就是说, 不是用来强化那些总是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的统治的工具。或许自相矛盾的是, 尽管变化的相关结果的动力和性质可以被追溯到科学、并往往可以在科学中生成, 但变化的模式和所产生的结构却越来越不服从于理性的计划、预先的决定和集中的控制。知识实际上损害了秩序。权力并非总是由知识来强化的。恰恰相反, 知识往往使权力变得过时。通过打乱现存的权力平衡, 知识可以使无权者得到权力。我想论证的是, 在目前、甚至在

① 还有某种与之相关的术语方面的问题, 因为语词“知识”至少就其在英语中的用法而言, 常常与“真理”的意思发生密切的共鸣关系(参见博尔丁, 1966:1)。这种密切关系的存在有着充分的理由。在现代科学之合法性的发展过程中, 作为一种证实科学知识的主张既不同于“认识”的其他形式, 在实践中也是特别有效的文化手段, 这样一种关系被证实是有用处的。

未来,偶然的情况和事件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对围绕着更加广泛的世俗趋势而变动的理论说明中,都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即使有关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日益”增加。既然知识绝非是绝对的,所以脆弱和矛盾就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这些东西是否实际上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这个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困惑之一,而这就是我在这项研究中打算去论述的问题。

除了这项研究的中心论题——即需要有一种能够与各种新的社会现实产生共鸣的社会理论——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问题和方法,对于它们我想在此至少作一简要的论述。正像我对科学知识力量的限制的评论已经表明的那样,这一研究试图将那些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经常被弄得越来越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关于科学、技术、文化和社会的论述仍然倾向于受那些过分投入的人的思考的支配。例如,现代科学的赞同者和反对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科学知识超越了传统知识,并将在现代社会中取代传统知识。社会科学家赞同这一主张,尽管认为关于事物、人、能动作用或意图的常识概念也许具有一种不可更改的特性的哲学观点越来越得到巩固和接受。不过,我同意对于科学采取由克利夫德·格尔茨(1973:33)所简洁阐述的那种方法论的和理论性的策略:“科学的进步往往在于某种逐步的复杂化,就是将曾经似乎具有美妙的简洁性、但现在看来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过分简单的那一套概念弄得复杂起来。”社会科学中的一致意见通常是建立在传统的猜测基础上,有时甚至是建立在对特殊知识主张的缺乏思想深度的重复的基础上。

此外,尽管——一度也是由于——有知识社会学的努力,我们关于知识的知识仍然是简单的、不全面的。科学的论述对于它自身的知识展现出一种自然的态势。出于——但不仅仅是——这

个原因，许多得到清楚阐述的知识范畴已经被正当地限制在社会学中。比起马克斯·舍勒早期对于知识社会学的贡献中关于知识的不同形式的观点来，我们的确没有前进多少。知识常常被当作一个黑箱。这样，阐述一种社会学的知识概念及其在现代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似乎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了。

进而言之，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理由要求我们密切关注现代社会中的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结构的性质。知识社会的发展是与经济活动结构中的基本变化连结在一起的。或许自相矛盾的是，经济的自身变化降低了——尽管不是消除了——经济的重要性。我对现代社会之变化着的经济结构的兴趣并非以某种功能主义的视野为基础，后者主要表现出对经济决定论的某种递减的边际效益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影响的兴趣（参见英格莱哈特，1987:1289）。与之相反，我也关心产生和构成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变化之动力的那些条件。就某些有关联的结果而言，并从个体的观点——例如，占据中心地位的生活兴趣从纯粹的经济兴趣上偏离出来——来看，或者从社会冲突的观点来看，一种趋向于普遍化的斗争的变化可能有望在知识社会中支配各种政治议程。能够容纳诸如此类的变化的那些条件是最后的、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经济变化。不过，例如仅仅宣布在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匮乏相比较而言已经大大地减少了，这是不够的。^①

在知识社会中，工作的社会组织及其数量和性质都被改变了。我将在变化着的经济结构的背景下讨论这些变化，但是我也想尝试着去概述这样的问题，即当代社会中的专家、顾问和指导者或以知识为基础的的职业的那个越来越强大的阶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方面的重要性。我的基本主张将是这样的：这个职业阶层